■ 青年人才发展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5.03.007

通往学术之路的“打杂”:硕士生参与学术辅助事务的体验研究

卢　意,雷　爱,巫　晖,张瀚文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在与制度规定和培养目标相关的学术参与活动之外,学界往往忽视硕士生学业生涯中的另一面——在日常学术工作中需要承担的诸如项目报销、会议组织等具有学术辅助性质的事务,这些事务常常被隐喻为“打杂”。基于对 9 位硕士生、5 位高校教师的深度访谈和研究者自身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在承担打杂工作的过程中,硕士生作为“帮手”,具有委屈与感激交织的情感体验。然而,由于师生之间存在着私人情感与共同体的组织理性的矛盾,学生只能在打杂中通过情绪的隐藏和清理来再认学术共同体中难以突破的权力结构关系。这种情绪的集散和关系的冲突反映了师生对打杂和学术的理解错位,当导师强调学术的知识社会性时,学生坚持了学术的道德主动性。具体而言,导师看到了一种综合的、全景的学术认知的必要性,而学生的抵抗背后是对合法的边缘性中的“合法性”本身的怀疑。然而,打杂最终并不成为硕士生学术发展的关键要素,硕士生对学术资本的主动争取、导师对资源的授予以及师生之间双向的情感投入,构成学术实践共同体中更为关键的支持。理解打杂在硕士生发展中的位置与意义也成为透视整个学术结构的窗口。学术共同体需要重视硕士生的学术体验与打杂体验的嵌套关系及其背后学术权力结构的变化,构建更加真实与坦诚的制度性支持系统。

关键词:学术新人;非学术工作;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硕士生;情感世界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5)03007911

致谢: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康永久教授、程猛副教授的指导及王曦影教授在学术写作课上的支持。感谢南京大学季春梅教授、浙江大学韩双淼副教授在学术论坛中的点评与建议。感谢访谈伙伴和写作支持小组。文责自负。

修回日期:20250203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培优项目“一流教育学科优秀人才培养机制与成效提升的研究与实践创新研究”(YLXKPY-XBTC202201)

作者简介:卢意,女,浙江金华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研究;
雷爱,女,河南周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研究;
巫晖,女,湖南永兴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研究;
张瀚文,男,湖南常德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研究。

引用格式:卢意,雷爱,巫晖,等.通往学术之路的“打杂”:硕士生参与学术辅助事务的体验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3):7989.

Citation format:LU Yi, LEI Ai, WU Hui, et al. The “miscellaneous tasks” on the road to academia: a study on master's students' experience in academic support activitie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5,13(3):7989.

一、问题提出

科研是与知识生产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与编排学术事务相关的学术组织,人们在这样的学术情境中分工、互动并塑造关系,而学术职业正是“通过这些关系而再生自身”[1]。对于硕士生而言,师生关系类似于学徒制中的匠师与学徒的关系,帮助导师“打杂”是他们参与学术事务的必要方式,也是融入学术体系的契机。在这里,“打杂”特指如项目报销、会议组织、取快递等被硕士生看作具有学术辅助性质的事务。2024 年 4 月,北京邮电大学 15 名硕士生在网络上公开联名举报导师,“越来越多与科研无关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时间”[2]。在这起极端事件中,硕士生的打杂蕴含着“使用”与“培养”之间的张力,由师生权力关系造成的困扰再次引发广泛的公共讨论。

打杂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词汇,它既隐喻着一些琐碎、不重要的工作或任务,还具有勤劳与务实的道德内涵,同时暗含着分工与等级观念。与之相似的是,美国学者戴乐·鲍尔(Dale Bauer)提出的“学术家务”概念(academic housework),最初用以分析学术界存在无意识的性别分工[3],冰岛大学社会学学者海斯特拉(Heijstra)将其进一步拓展为“学术人在学术生涯中承担的不被高雅学术认可的学术服务工作”,将目光转向了那些刚获得博士学位或大学教职的学术新人[4]。可见,当前学术体制的变化已将更多的学术新人卷入其中,硕士生往往也需要面对更为繁杂的象牙塔生活。在不为人知的学术一隅,很多硕士生在承担具有学术辅助性质的打杂工作时,内心涌动着复杂的情感,产生深远的学术体认,但常常被人忽视。这些情感和认知使他们成为学术体制中不为人知的经验的承载者,也成为我们考察这一公共性议题的重要视角。基于此,本研究意图探究硕士生在打杂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及对学术的理解是怎样的?具体而言,本文旨在深描具有打杂经历的硕士生成长经验,分析学术共同体内的学术辅助事务对硕士生成长的复杂影响,进一步揭示师生关系、知识生产与学术权力的关联,唤起人们对学术人及学术空间的情感思考。

二、文献回顾

打杂是一类关系到“使用”“依附”还是“培养”的事务,通过师生关系、学术生态及情境学习等多种视角考察,硕士生在打杂中面临的风险与发展机遇有了进一步厘清的可能。尽管硕士生参与导师事务具有成长的可能性,但导师对硕士生的“使用”凸显学生参与打杂的体力劳动和情感劳动[5]等诸多隐忧。许多研究都关涉师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失衡和生产劳动关系异化问题[6]。其中,导生关系中的剥削行为使学生把自己称为“廉价劳动力”,把导师称为“老板”,把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称为“打工”,最终促使师生关系转换为包含着利益诉求的“雇佣关系”[7],导师即“老板”的现象仍然盛行[8],导生在交往过程中呈现“相安的疏离”和“表现式亲密”的亚健康状态[9]。在这种以打杂为纽带的师生交往中,硕士生也体验着被支配与割裂的时间和导生间不对等的“情绪劳动”规则[10]。尽管这些事务参与的冲突性后果成为在读硕士生的公共困扰,但高校管理者在理性管理的偏好下,很少主动介入管理或将其公开化,在读硕士生作为“高校学术生态的边缘圈层”[11],在更大范围内可能遭受此种高等教育文化的挤压。可以说,打杂的参与可能导致部分学生处于情感障碍之中,造成学术信念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如果导师给出了打杂的具体任务,硕士生承担了打杂的具体工作,那么是谁制造了打杂本身?从现有研究来看,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和审计文化[12]盛行是制度层面的根源之一。在资本逻辑、市场机制对学术的介入过程中,“知识成为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学术资本’”[13]。只有不断积累自身的学术资本,大学才能够从外部换取更多生存必要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在一种极端化的过程中,强调经济价值的学术资本主义相伴而生[14]。项目制加强了学术权威和

文化资本的体制化,不同位置行动者进行着等级强制互动,本应服务于教学的共利性和普惠性的价值目标被换成私利性和个体性的价值目标,营造了新的大学生态[15]。在此种意义上,导师兼具高校审计与管理文化泛滥的代理人和受害者双重角色。如今学术项目和课题虽是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但也是学术知识商品化的体现。高校教师作为主角用其“规训”和“被规训”的实践再生产着制度逻辑[16],自身处境和学术发展[17]都受其制约,而学生的行动也“依附”于这样一套制度[18]。硕士生作为“廉价劳动力”承担边缘性学术事务,知识生产劳动被异化为满足导师获取利益的行动。“依附”并非纯粹的消极道德判断,而是由于学术世界以学术资本为权力媒介,打杂可能培养出如人类学家哈维兰(Haviland)曾提出的那种顺从、忍让、与世无争且具有责任心的人[19]。可见,打杂中的非预期后果指向了导生交往困境和学术资本主义下大学文化传统的变迁。

然而,在众多消极阐释之外,出现了一种“培养”视角,打杂被视为是一种典型的“投师”和“学艺”的学术成长历程。莱夫(Lave)等提出“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概念,在这种情境学习视角下,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是学习者获取进入共同体资格的关键途径,这种学徒制能够帮助参与者在实践中获取结构性资源[20]。“知识获得与身份获得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在教师视角下,“拒绝参加课题研究的学生,除了无视大学里的现实制度安排(逃避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也剥夺了自己通过‘参与’而成为研究团队成员的一个机会”[21]。因此,打杂使硕士生以知识的情境性立场习得实践共同体中的缄默知识。不过,这种打杂特别依赖导师的学术支持和学生的个人价值判断,有硕士生从杂事中感受到了价值[22]。也有关于硕士生学术热情变化的个案研究指出,“即使就读期间导师给她布置的一些学术任务,也基本上都是一些琐碎的‘杂活儿’”[23]。可见去学术化的学术支持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对学术组织的拒斥感和失望感,影响硕士生“应对、接受、适配其所在的学术实践共同体”的方式和选择。

已有研究勾勒出打杂对硕士生兼具成长性和压制性的矛盾,但却对打杂的细节和情境,硕士生的身份认知、学术认知及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审视。如果说接受来自导师的杂活,相信导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累积学习’的过程,而是一个‘适应性学习’和‘转化性学习’的过程”[21],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哪些最初的向往、珍贵的品质和学术的理想被“适应”和“转化”掉了,或者焕发出新的面貌?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折射出高等教育中学术世界的另一面。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旨在深入探讨打杂硕士生的情感体验与认知。质性研究依赖研究者的主观经验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并通过归纳法分析资料,形成理论[24]12。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是理解行为和意义建构的重要途径,质性研究的结论不必也无法完全客观化[24]8。本研究试图通过参与式观察、硕士生访谈和导师访谈等多种方式呈现对学术“打杂”具有流动性但又相对稳定的理解。

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方法。从2023年起,研究者以主动寻找、相互推荐、网上发布招募公告方式寻找参与打杂的硕士生,并聚焦打杂中的情感体验、师生互动、学术交流等方面进行两轮访谈。第一轮通过私人关系选择了4位硕士生,第二轮通过网络招募了5位硕士生,涵盖不同学科背景、学业层级和打杂经历。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从第7位受访者开始,资料丰富性与前者相似,在补充访谈2位硕士生后未得到新的有效信息,决定停止数据收集。此外,为了深入理解师生的打杂视角之间可能存在的错位与张力,我们还访谈了5位高校教师,包括3名副教授,2名讲师,这些教师具有不同的教学背景和指导方式,其观点、经验和看法也各有不同。就质性研究而言,“研究结果的效度不在于样本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样本的限定是否合适”[24]104。因此,根据已收集到的资料,我们认为可以对研究问题作出相对完整和深入的理解。为充分尊重和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我们对名字、所在高

校和部分自述信息进行了改动和模糊化处理,所有访谈者信息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研究对象	性别	年级/职称	所在高校	打杂自述	专业类别	访谈时长
S-毛毛	男	研一	“双一流”高校	拿快递、签字、做课题	工科	60 分钟
S-胡图图	男	研二	“双一流”高校	不停做课题,“全都跟以后研究没关系”	工科	60 分钟
S-巴豆	男	研一	“双一流”高校	主要做横向项目	工科	60 分钟
S-苏舒	女	研一	“双一流”高校	负责师门报销	文科	60 分钟
S-佟童	女	研二	“双一流”高校	负责学院报销、会议布置与接待等	文科	50 分钟
S-阳光	男	研二	“双一流”高校	写课题结项报告、报销	文科	90 分钟
S-噜啦啦	女	研二	“双一流”高校	报销	工科	60 分钟
S-飞鸟	男	研二	“双一流”高校	负责报销、组织会议等	文科	60 分钟
S-太阳	女	研一	“双一流”高校	负责报销、做课题、完成琐事	社科	30 分钟
T-蚕挞	男	副教授	“双一流”高校	请学生报销、做课题、完成琐事	社科	120 分钟
T-大鱼	男	副教授	普通高校	请学生做 PPT、填报材料、报销、完成琐事	社科	70 分钟
T-温柔	女	副教授	“双一流”高校	请学生帮忙报销、做课题、完成琐事	社科	60 分钟
T-小蝴蝶	女	讲师	“双一流”高校	请学生帮忙做课题、完成琐事	社科	60 分钟
T-青山	女	讲师	普通高校	请学生录问卷、做课题报销、完成琐事	社科	60 分钟

参与式观察是本研究资料收集的另一种方法。陈向明认为,研究者有四重身份:完全的参与者、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完全的观察者[24]62。研究者自身长期处在打杂情境中,更多情况下是“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和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从“局内人”视角出发,通过微信群或个人记录分享打杂的体验、观察和思考,即时、持续地记录近 2 万字的文字资料,希望通过上述方法,探索硕士生参与打杂时对情感体验、导生关系的反思,以学生视角重新理解学术共同体的价值。

四、打杂历程中的情绪图景

无论是导师或学生,都在打杂中产生情绪体验乃至学术认知。如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所言,我们对待情感生活所采取的文化政策是“警惕它,管好它”,而容易忽略“对所有常见但不显眼的实例中情感与行动关系的观察”[25]。因此,只有当我们直面它、讨论它时,才能看到导生是如何在情绪和情感中建构关系,也才算走进打杂这一问题。

(一)“帮手”的情绪生成

打杂是一个做帮手的过程,既是做导师的帮手,即帮导师完成工作,是亲、敬、怕兼有的尊师重教心态,也是做自己的帮手,在复杂情绪体验中,通过边缘性参与帮助自我走进学术共同体、建构学习生活。

确实是对师生关系的一个促进,因为如果老不见面,那就很陌生……人和人,你见面见多了,自然而然熟悉感就建立起来了。(S-佟童)

我“用”学生的时候,也不是平均去“用”的。如果有的同学表现出他对这个事情是很开心的,是很愿意去做的,那我更可能会去找他。(T-青山)

对于部分硕士生来说,打杂是具有温情的成长性过程。“在一次学术会议现场,一位主持人老师介绍会务同学时说,‘天天(化名)也是我的硕士生,马上要读博士了,让她为大家服务一下’”。(来自参与式观察笔记)“服务”为学生承担打杂工作赋予责任和道德意味,也隐喻着学生在此之中成为助手或帮手,打杂成为帮忙的行动,学生得以拥有施展身手和社会化成长的可能。同时,在师生因打

杂交流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不同亲疏远近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并不是充分参与学术共同体的必需条件,但作为情境性要素向导师暗示了个体加入共同体的意向性和能力倾向,使导师有意识地“因材施教”,让不同的学生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学术共同体。

报销这个事都没有人教我,我也是经常去问老师,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们态度也不太好……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谁也不爱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复杂又不好搞的事情。(S-噜啦啦)

急匆匆、不能拒绝、又想做又不想做又担心做不好,我又委屈又气,我们学生真的容易产生这样的情绪。(S-飞鸟)

另一部分硕士生则让我们得以窥探打杂中的负面情绪。例如,“报销”作为一种打杂事务具有突出的必要性,它不仅是一般性的行政工作,也是链接当下学术运转的一个枢纽。然而,这项工作由于时间的不固定、事务的密集性、流程的复杂性和对学术课题的重要性,成了“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不太好的消耗”性事务,最终只能由学生小心谨慎地承担。其他支持学术交流的打杂事务同样体现了硕士生慌乱与烦躁的个人化体验——一场正式的小型研讨会需要会务同学承担提前准备诸如桌签、一次性水杯、矿泉水、摆桌子、借教室、调设备等事务,在会中拍照、续茶,会后收拾现场等学术辅导事务。尽管从局外人看来,这类事务不算繁杂,但处于弱势关系地位的硕士生们其实有着独自摸索的迷茫、不知向何处询问的慌张和被打断时间的忍耐。

(二)情绪的隐藏和清理

在硕士生看来,由于身份的不对等,打杂中的诸多负面情绪难以直接反馈给导师,反馈本身意味着被转化和解读的不可控风险。在这种兼具成长性和压制性的矛盾中,硕士生不得不进行情绪管理,而在这种情绪管理机制之下,师生之间的互动带有判断、筛选与关系重塑的意义。

反馈给老师后会很奇怪,怕老师觉得你是如何如何的人。这个如何如何,既包括老师觉得你小气、自私,也包括觉得你敏感、需要照顾。(S-飞鸟)

首先,情绪“隐藏”成为打杂中一种必要的压抑或洞察。硕士生认识到,情绪宣泄可能会遭到拒绝,甚至还会让导师产生不好的印象,影响角色形象,从而选择忍耐和掩盖情绪。正如《斗室星空》中所说:“我始终没法控制在我身上来去自如的情绪,它们是不速之客,但是当它们大驾光临时,我也只能退位、缩小,用我最宝贵的时间来等待它们离去。”[26]

首先你会理解导师,他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我每次有一些负面体验的时候……会觉得导师本身事情就很多,你又是他的学生,你帮忙也是帮他分担一些压力。(S-飞鸟)

除了情绪“隐藏”以外,情绪“清理”成为解决问题的第二个出口。一位导生关系良好的研究对象为我们呈现了面对打杂时的纠结叙述。一方面,这些琐事虽然可以帮助硕士生接触到学术世界,但总体是一种缺乏创造性的打断机制,打断硕士生还需完成的上课、作业、读书、论文等安排;另一方面,一些硕士生试图通过将诸多情绪归咎于学术体制等结构性因素以说服自己,并赋予其价值。部分硕士生也用类似的理由“清理”委屈而无奈的情绪,或是试图将自己变成纯粹的执行者,减少投入时间和情感劳动以阻断这类事务对自身的影响。

从这种情绪管理中可以看出,尽管部分师生之间可能存在相互理解,但从整体上看,有一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理解贯穿始终。在更为公开的学术共同体层面,导师始终以家长的姿态、理性的方式作判断,其行动传递了共同体中严密清晰的权力结构关系。学生对这种权力不平等的感知,是在打杂中通过一次次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的消极情绪及其管理被再次确认的。

可以说,在硕士生的打杂体验中,他们通过做帮手,内化了打杂事务的责任和道德意识,清理或隐藏自我情绪。通过打杂建立的私人关系使学生与导师之间形成了不同亲疏远近的关系。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大部分学生对权力不平等的亲身体验,师生之间的私人关系与共同体关系的二元割裂重构

了学生对学术世界的体认。

五、关于打杂的两种认知

情绪在打杂中成为一种必要的忍耐、洞察和展示,使硕士生产生了复杂的情绪管理机制和师生关系认知。更为关键的是,本文的打杂概念尚未完全厘清,打杂背后暗藏着硕士生与其导师在互动中的反思——究竟何为打杂? 其与学术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才会让硕士生觉得低人一等,让打杂事务不被硕士生承认? 这些问题是我们理解打杂本身的关键。我们从导师和学生的立场出发,发现了打杂的两种认知:一种是“使用即培养”的导师认知,另一种是“打杂作为道德要求”的学生认知。同时,对学生而言,打杂的道德要求带来了道德负担,对于道德被动性的排斥构成了负面打杂体验的重要来源。

(一)使用即培养:打杂的学术社会性

在硕士生导师看来,“帮导师买饭”是双方都承认的打杂活动,但更多时候,打杂一词更像是一种污名,是对那些不与知识本身直接联系的学术事务的否定,而学生将具有学术性质的事务误归为杂活行列。

导师们承认,打杂就是做“非学术”工作,但是他们对学术的理解不在于是否直接导向了学术世界的知识生产,而在于从长远来看是否对人进行了综合培养,是否有利于学生发展创造力,适应社会规则并自我成长。

在学生那个阶段,在理解学术事务的时候,往往会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崇高的、神圣的某种知识生产……就好像我直接面对这些书籍,直接面对核心的知识的东西。但你接近当下的学术本身,其实是要通过接触人,认识人……本身它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你又可以跟这些老师有一些在书本之外的交流……让你去接触到学术本身更复杂的或者更真实的那些方面。(T-蚤挞)

“担任答辩秘书是否学术性事务”这一问题,充分体现出师生在理解打杂时的矛盾。许多硕士生基于时间的占用、身份的边缘等体验给出了否定回答,相反的是,访谈中的硕士生导师们则充分支持这一事务的学术性。在他们看来,硕士生没有认识到这些事务与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诸如答辩秘书、做课题等活动都是以情境性方式理解学术生活的行动,具有重要价值,应当被看作积极主动的学术组织工作、与导师并肩作战的行动以及学术仪式的组成部分。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共同体……那我们为了这个团队获得一个提升的时候,肯定不可能全是学术的,或者说在学术里面它也分不同类型的活。(T-青山)

总而言之,导师视角肯定了“学术蕴含社会性”的理解,认为人的社会性塑造、现有学术体系的承认与知识的生产具有同等地位。就如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中所说的:“这可以看作知识的阶级功能……理论作为社会性的掩护,是攀登社会阶梯的力量。”[27]具体的知识本身在学术体系中充当着核心的支柱力量,但更为重要的是借助知识的名义,学术实践共同体中的成员可以积累学术资本,获得制度性承认,从而使围绕知识生产的系列活动都具有意义。如福柯(Foucault)所言:“或许,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28]29 因此,导师们认同“使用即培养”的教育理念,将硕士生眼中的杂活当作一种综合性的、成套的训练,帮助硕士生建立对学术世界乃至生活世界的全景认知。

(二)作为道德要求:学生视角下的四种打杂

当导师着眼于整个学术实践共同体的阅历积累及其兑现的可能时,会发现“知识即正义”似乎不足以概括硕士生对打杂的认知。通过对学生访谈可以得知,学生视角打杂的具体内容包括:(帮导师)取快递、带孩子、带饭、送文件、陪应酬、帮订餐、外宾接待、报销、做会议/答辩秘书、做横向/纵向

课题等事务(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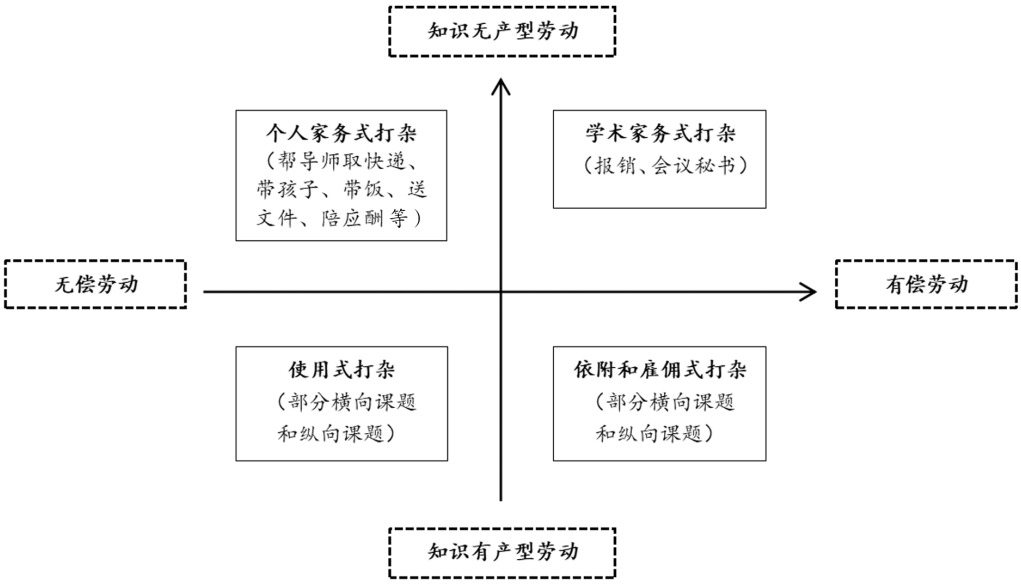

图 1　学生视角的打杂类型划分

对于这些打杂之间的区别,受访者常提到“给不给钱”和“与学习有没有关系”,即金钱分配和知识生产恰恰是硕士生判定打杂类别的两个核心维度。根据这两个维度,打杂内容可被归纳为:个人家务式打杂、学术家务式打杂、使用式打杂、依附和雇佣式打杂 4 种类型。这 4 种打杂或多或少都具有家务劳动的性质。“家务事是什么呢?……‘为了家人能够安心生活而做的工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回答”[29],而硕士生打杂恰恰揭示了以“让导师能够安心科研而做的工作”背后的学术结构问题。在这 4 种类型中,“依附和雇佣式打杂”相对更能被硕士生接受,因为适宜的金钱报酬代表了对事务本身和学生参与的重要性的承认,知识创造活动代表了对学术追求、学术理想的尊重。然而,哪怕是兼具金钱与知识的活动仍然可能被硕士生视为打杂,仍隐喻性地被表达为低人一等的、不被承认的事务,这似乎与导师们所认为的社会性认知不足相悖。

我们也把写论文当成任务。写作,其实按理来说是自己学习的事,对不对,但是呢?老师他会给你明确的题目,以至于你会感觉你就有点像帮忙打工的样子。说实话,确实是在帮他打工……因为他很多项目的结题需要论文发表……(S-阳光)

硕士生也将打杂和“非学术”画了等号,但他们对学术的理解并不从社会性的视角展开,而指向共同体参与的合法性的追问——为何我对知识与学术的理解被轻易边缘化,参与的合法性究竟是谁的合法性?打杂的边缘性在知识的情境性和间接性中得以展现,其合法性也在学术共同体中得以承认,但学生身份下的学术认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以致硕士生以边缘身份参与共同体的过程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具有一种被动的道德驯化意味。也就是说,在硕士生边缘性的参与过程中,导师的策略维护了共同体的秩序和权威,但部分压抑了创造、挑战和学术突破,学生的声音被忽视,其中包含学术新人对真理、谬误的边界的追问也被忽视。因此,打杂事务的核心矛盾在于学术的知识社会性与道德主动性之间的错位——当导师以为学生缺失学术的知识生产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联的正确认知时,学生的反抗背后透露的是对这种正确和合法性本身的怀疑。

六、学术成长中的支持

硕士生打杂充满了道德和情绪上的被动性,也有对共同体参与合法性的质疑,影响了硕士生的不

同道路选择。但归根结底,打杂中所涉及的学术事务乃至对打杂的理解都不是硕士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师生的情境性互动对硕士生的学术认知和道路选择有更直接的影响。

(一)学术资本的争取与占有

打杂揭露了学术场域性质的变化,即由有边界的理论生活世界变成了资本市场的延续与附属,而硕士生的打杂就是一个被卷入其中的、充满道德被动性的过程。但边缘性参与的硕士生们也洞察到,打杂的被动性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有赖于师生双方的意愿——学生的积极行动可以将道德的被动性转换为学术资本获取的主动性。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是这种辅助的身份,你不能一上来就说老师你送我一个 C 刊。这件事情很不现实。这个事情的积累够了,自己才能爬到那个世界上面。(S-苏舒)

你要说有没有人情的因素呢,有的时候是有的……然后心里会有情感上的责任意识吧,我觉得让大家这么尽心来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然后能够给大家什么,这是我会想的一个问题。……虽然没有那种明确的兑换的意思,但是确实会顾及这个。(T-蛋挞)

在最初进入学术共同体时,硕士生使用学术资源的方式是边缘性的,且几乎必须以生产性劳动[30]的方式进行精神产出或物质产出,学生只能被动选择如何使用和变现。在这个层面,硕士生若不能顺应制度规则、顺应导师的生产性劳动要求,那么即便在形式上成为其中一员,也会使他们在参与中被学术共同体“隔离”或拒绝。但如果学生帮助导师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学术劳动,师生也都认同打杂背后有一种传统的人情往来规则,因此导师对学生的回报具有了正当性。这种回报可能是主动的资源给予,也可能是被动地对学生自主使用资源的默许,或者更“吝啬”一点的导师,就是让学生获得“毕业”这张通行证。

可见,打杂使得学生的回报索取具有道德的主动性,较为顺畅地获得“合法的参与者”的两个条件:“形式上需要参与与其专业领域相关的工作,内容上需要在参与过程中给予个体获取共同体知识、技能、资源等内容的权力。”[31]因此,打杂不只是情境学习理论中所谈及的“边缘”到“充分”的过程,而确实有从“边缘”进入“中心”的成长脉络——从学术资本的权力视角看,这种打断有利于硕士生进入权力中心,使他们一步步正当地掌握学术资本,这种成长变化具有一种从打杂的被动性到学术的主动性转换意味。

(二)知识与情感的创造性力量

打杂中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换揭示了它可以通过师生互动中的权力授予来影响学术人的再生产。然而,许多硕士生已经充分参与打杂,逐渐找到学习节奏,摸清学术共同体的作用机制,甚至占有了一定的学术资本,但他们仍然对自己接近学术中心感到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是由于师生之间的情感敞开与真正的知识关切的缺失。在打杂中,我们可以依据导师是否给予指导的维度对师生关系作出如下理解(见表 2):

表 2　打杂与师生关系的类型

	导师给予指导	导师不予指导
学生不打杂	理想型	放逐型
学生打杂	知识授权型	知识剥削型

对于师生关系而言,尽管“干杂活是否一种利益交换”的问题一直横亘在硕士生边缘性参与的过程中,但师生之间的真切情感和知识投入容易让双方对其进行浪漫理解,即将其理解为一种情感互换。在访谈中发现,仍有意愿读博的学生打杂大多属于知识授权型,即打杂且导师给予指导。师生在这个过程中有或多或少的互动或情感联结,硕士生通过打杂率先向导师表达敞开的情感状态,进而吸

引导师通过学术共同体中的分工给予学生需求的帮助。导师认为学生完成工作是对教师本人的体谅、理解和顺从,从而使这种指导除了资源和权力的授予之外,还带有关怀和培养的意味。

这可能是我本身的身份带来的,就是他帮我干了活,我也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什么资源……可能是我自己不够好……他会觉得如果老师给了他这个机会,他也会非常感谢,他会努力试一试。我的学生可能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说他不愿意干这个脏活累活,他可能更需要的是科研上的署名。(T-青山)

除了师生互动中的情感交换以外,无论打杂是否具有物质回报,师生互动的关键在于导师点燃学生对学术生活的热情,也就是说,“充分”的参与并不代表着硕士生对学术世界的真正接受和进入,导师面向知识本身的真诚和面向学生个人发展的真诚深深影响硕士生学术志趣的形成,并有利于建构一种良性的“对话—沟通”的双边互动关系[32]。当导师回应了学生对“我是否重要”“这些事对现在的我有何帮助”“学术的方向是什么”等问题时,学生的主动性在共同体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在边缘性参与过程中很有可能进一步具备认识整个学术世界的勇气,从而对学术的志趣在交往本身的满足中不断增加。如果教师没有在情感和行动中展现对学生的真诚关怀和对学术的纯粹投入,作为新手学习者的硕士生可能很难顺应或接受这一参与方式,那实际上就丧失了机会和权力,学术的市场化很快就会淘汰那些没有能力、抗拒进入的人员,合法性赋予就不再成为可能。

七、结　　语

对学术世界的围观者或边缘人来说,学术往往蕴含着超越性、崇高性或神圣性的魅力,但实际上,学术是一个包含学术生产与各类学术事务的混合体,也正如布迪厄(Bourdieu)所说,需要面临“决裂”[33]时刻。在学术世界的不同位置,个体的生存空间往往具有独特的情境。尽管打杂帮助许多硕士生成为自己和导师的帮手,但他们还是感知到了“委屈而无奈”的消极情绪,并在情绪管理中认识学术共同体的另一面。然而,打杂的道德被动性动摇着学生对学术世界的“信仰”,甚至作出“非学术”的认知判断。基于此,硕士生导师回应了硕士生打杂中的“非学术认知”问题,强调学术的社会性同等重要。最终,尽管师生双方对打杂的认知不同,但打杂对硕士生角色认知和学术道路的选择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学术资源的传递、情感的流动关系反而更为重要。可见,师生对打杂和学术的认知,不仅是个体学术实践的产物或导生关系的问题,还依托一套强调指标和项目的学术文化。由于高校审计制度的强制性规定,导师尽管存在不忍和愧疚,但仍然不得不通过课题、项目来获取学术资本[12],来确保以导师为中心的整个学术共同体的生存。在此基础上,硕士生有机会逐步获得使用导师学术资源进行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如福柯所言:“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28]29 这种基于指标的学术模式将硕士生训练成一个辅助现有学术制度的熟练工,这种偏离学术意愿的行家能力,让师生在互动中产生了对现有制度的依附。因此,在资源相对紧张的学术环境中,硕士生打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生存策略,而打杂不仅是师生之间权力关系重塑的过程,也是一个微小的学术实践共同体与整个学术共同体的权力关系重塑过程。在这样相对单一标准的结构框架之下[34],师生双方都有可能在无尽的效率追求中耗尽自我。

在现行学术情境之下,“使用”和“依附”已经难以回避,那么更值得思考的是如何赋予他们更积极的道德内涵。也就是说,既然师生之间的“使用、依附还是培养”并非由单一的学术活动本身所决定,那么不同的互动机制及其情境化理解就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此,我们需要一种良好的硕士生“培养”机制。这种机制不仅依赖师生之间良性的学术传递和情感互助,也需要在师生之间重建更为平等的学术关系。因此,更为可行的是构建一个合理的师生权责关系制度[35]。一方面,建立畅通的导师选聘和监督机制可以增加师生间的信任,如导师资格的遴选不应仅依靠职称、课题等外部指

标,而应采用真正综合的评选方式,并适当增加学生的声音;另一方面,一个更为自由的导生选择和退出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即师生双方应当平等地具有选择和被选择、调整和被调整的制度资格,才能在师生之间形成良性的权责关系和互动关系。不匹配的互动所形成的暴力冲突或者受挫,最终会导致硕士生退出学术世界,但如果这种互动可以建立起一种连接——不论是浪漫化的理解还是实用理性的追求,硕士生更容易进入学术世界之中。

由于导师维度的访谈对象仅限于人文社科,研究具有局限性,值得我们继续追问的是打杂对于不同学科来说是否有差异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反映学科结构的异质性的。对于人文社科而言,可能课题的经济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课题代表了高校教师所能获得的生源、待遇等外在指标,这些指标成为与外部市场衔接的符号性货币,其经济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于理工科而言,知识结构与市场之间的紧密程度和作用机制与前者有所区别,打杂所带来的学术资本对学生道路选择和资本的市场化路径也有所不同,值得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 唐纳德. 肯尼迪. 学术责任[M]. 阎凤桥,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19.

[2] 北邮通报“15 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取消郑某研究生导师资格[EB/OL]. (20240410)[20241023]. https://www. guancha. cn/politics/2024_04_10_731234. shtml.

[3] ROBYN W, INDERPAL G, CAREN K, et al. Women's studies on its own: a next wave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245257.

[4] HEIJSTRA T M, STEINTHORSDOTTIR F S, EINARSDOTTIR T. Academic career making and the double-edged role of academic housework[J]. Gender and education,2016,29(6):764780.

[5] 刘志. 研究生导师和学生关系问题何在:基于深度访谈的分析[J]. 教育研究,2020,41(9):104116.

[6] 刘志. 导生关系的内在规定、对象范围及基本特征[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12):49.

[7] 李锐,张钰珞,安亚伦. 师生关系理论规定导学关系的批判式分析及其重构[J]. 教学研究,2023,46(4):17,15.

[8] 陈恒敏. “老师”抑或“老板”:论导师、研究生关系的经济性[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4):7377.

[9] 杜静,常海洋. 博士生导学关系中交往理性的缺失与回归[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4):2835.

[10] 林杰,刘业青. 重建巴别塔:导生隐性冲突的生成与归因[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43(2):7383.

[11] 赵思齐. 在圈外:硕士研究生关于高校学术生态的认知及应对策略的个案研究[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22:35.

[12] 林小英,薛颖. 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宏观逻辑和教师学术工作的微观行动:审计文化与学术文化的较量[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4):4061.

[13] 李丽丽.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学术资本主义”[J]. 文化研究,2020(1):282291.

[14] 黄璟琿. 学术资本主义与研究议程的重塑:挑战与契机[J]. 重庆高教研究,2022,10(6):115127.

[15] 孙丽芝,陈廷柱. 大学教学项目制治理:逻辑困境、特殊问题及风险防控[J]. 江苏高教,2022(3):4348.

[16] 刘云杉. 大学教师与中国现代化[J]. 大学(研究与评价),2008(4):7883.

[17] 刘超. 逃离“象牙塔”:不确定性时代的大学与知识生产[J]. 中国图书评论,2023(2):726.

[18] 马焕灵,王金利. 研究生学术劳动:异化与“化异”[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4(7):5865.

[19] 威廉·A. 哈维兰. 当代人类学[M]. 王铭铭,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03306.

[20] J·莱夫,E. 温格. 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M]. 王文静,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

[21] 陈向明. 从“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看初学者的学习困境[J]. 全球教育展望,2013,42(12):310.

[22] 周晔,张锐,刘鑫. “共在”中的“差异”:师生视角下的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研究——基于甘肃省高校的调查[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23(6):5262.

[23] 朱志勇,刘婷. “挣扎的尘埃”:研究生学术热情变化的个案研究[J]. 教育学术月刊,2019(2):6876,111.

[24]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5]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心灵的整饰[M]. 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251.

[26] 夏林清. 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M]. 台北:财团法人导航基金会,2011:84.

[27] 保罗·威利斯.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 秘舒,凌旻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74.

[28]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9] 落合惠美子.21世纪的日本家庭[M].郑杨,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27.
[30] 张一兵.资本的伪生产性与生产性的劳动: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J].社会科学,2022(4):15-26.
[31] 孙欣欣,赵宝柱,孙芳芳.合法性参与:高职生有效技能形成的现实基础——基于8位高职实习生访谈数据的质性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0):5864,95.
[32] 罗梦园,杜静,白莹.互动仪式链视角下博士生与导师的互动类型及其转化[J].重庆高教研究,2024,12(5):8597.
[33] 皮耶·布赫迪厄.学术人[M].李沅洳,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408.
[34] 李彦,代阳.我国科研评价政策注意力配置的范式转换与决策偏向[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2):6979.
[35] 韩霞,于秋漫.研究生导师权力的实施及规范路径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3):6873.

(责任编辑:杨慷慨　吴朝平　校对:吴朝平)

The “Miscellaneous Tasks” on the Road to Academia: A Study on Master's Students' Experience in Academic Support Activities

LU Yi, LEI Ai, WU Hui, ZHANG Hanwen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academic participation activities related to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and training goal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ten overlooks another aspect of a master's student's academic journey—namely, the academic support tasks they are required to undertake in their daily academic work, such as project reimbursements, conference organization, and other similar duties. These tasks are often colloquially referred to as “doing the chore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9 master's students and 5 university professor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er's ow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it was found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performing “chores”, master's students, as “assistants”, experience a complex emotional mix of frustration and gratitude. However, due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rsonal emotion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rationality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tudents can only re-acknowledge the unbreakable power structures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y hiding and managing their emotions while doing these tasks. This emotional dispersion and relational conflict reflect a misalignmen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ores” and academia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en supervisors emphasize the social nature of academic knowledge, students uphold the moral agency of academia. More specifically, while supervisors see the necessity of a comprehensive, panoramic understanding of academia, students' resistance stems from doubts about the “legitimacy” within the marginality they occupy. However, doing the “chores” ultimately does not become a key factor i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master's students. The active pursuit of academic capital by student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y professors, and the mutual emotional investment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m a more critical support structure within the academic practice community. Furthermore,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cho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ster's students becomes a window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the entire academic structur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s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their experience of doing “chore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the underlying academic power structures, in order to build a more authentic and transparent institutional support system.

Key words: academic newcomer; non-academic work; borderline participation of legitimacy; master's student; emotional world